

1013

文史资料辑存



第四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常熟市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2/190/27

第四辑



(内部发行)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常熟市委员会
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一九六三年八月出版

~~一九八二年二月重印~~

《文史资料辑存》第四辑重印说明

我会编印之《文史资料辑存》第一至六辑，出版于“文化大革命”前。其中第六辑，出版时正值“文革”开始，未及问世，即被销毁。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政协恢复活动，首先重印第六辑，读者称善。至于第一至五辑，经过十年内乱，社会上流传甚少，各方需求颇殷。为此，决定先近后远逐辑重印。第五辑已于去年八月印行。今又重印第四辑，全书内容，除对明显的文字、技术性差错予以改正。一仍其旧，以维原貌，特此说明。

政协江苏省常熟市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
一九八三年三月

编 辑 凡 例

- 一、本辑存刊印的目的，在于保存和积累历史资料，并推动撰写史料工作的开展。所选的资料，大都是撰写者的亲身经历和见闻，有一定的史料价值；但由于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局限性，所述史料可能不尽翔实，地点可能不尽正确，因此，本辑存只在内部作为不定期刊物发行，以备历史研究工作者的参考。
- 二、本辑存所选的资料，包括从清末到全国解放各个时期的历史的各个方面。稿件只要确有史料价值，不拘观点，不限体裁。
- 三、本辑存所刊印的资料，欢迎阅读者提出补充和订正。
- 四、本辑编辑者对来稿可以选录，删节和作文字上的修改。

文史资料辑存第四辑

目 录

- 常熟“阳光社”始末……………归 含 沈雪侠（ 1 ）
- 常熟海虞市议会的回忆……………沈芳畦（ 13 ）
- 抗战前常熟县并乡设区概况……………归梦熊（ 22 ）
- “四·一二”被逮纪实……………曾雍孙（ 30 ）
- 一九三一年典当桥惨案实录……………沈仲山（ 36 ）
- 八年离乱，天亮前后……………俞九思（ 39 ）
- ✓ 谈谈常熟的天主教和五节桥毁堂案……………曹仲道（ 52 ）
- 我们所知道的常阴沙红卅字会……………虞卜磐 章太和（ 56 ）
- 谈谈“道德学社”……………邵景康 赵仁雄（ 62 ）
- 海虞医林丛话……………陶君仁（ 88 ）
- 锡沪公司回忆点滴……………曹师柳（ 102 ）
- 三十八年从事饮食业的回忆……………周润生（ 109 ）
- 国民党反动统治最初时期的“禁烟”政策……朱剑芒（ 118 ）
- 光华大学的诞生和变迁……………苏公隽（ 134 ）
- 海上群鹤……………吴琴一（ 139 ）

常熟“阳光社”始末

归 含 沈雪侠

一、组 成 前 后

1928年，虽是处于大革命失败之后，但上海文坛却相当活跃，如鲁迅的朝花社、蒋光赤的太阳社等继创造社先后成立，而新出版的期刊象《奔流》《太阳月刊》《朝花旬刊》等也相继发行，真如雨后春笋，盛极一时。这时常熟旅沪求学的许多爱好文艺的青年，很希望在课余阅读之外，有一个自己的组织，以便时常研究文艺创作和交流学习心得，但苦于没有机会。

这年暑假，张德、归含、肖怀古、吴泽炎等从上海回常熟度假。有一天，大家在归含家里聊天，谈起文艺学习的事，张德建议组织一个文艺社，这样，既便于交流读书心得，又可以相互观摩习作。当时大家都很赞成，于是就推定归含起草章程，其余诸人也作了初步分工之后，就分头进行筹备，这个文艺社叫什么呢？有人建议叫“微光”，有人建议叫“新阳”，最后经过各发起人的研究，决定社名叫作“阳光”。

就在这年八月的某一天，阳光社在常熟含晖阁十四号归含家中正式成立了，那天到会的约有十人，现在想得起来的有张德、归含、归荷、吴泽炎、肖怀古、钱学周、胡水波等，当时通过了社章，并推定张德和归含为负责人。社址就设在归含家中。在讨论宗旨时，曾有过一点争论，但最后仍确定了以宣传反帝反封建，研究新文艺为宗旨。章程中对发展社员也规定为只要赞成本社宗旨，爱好新文艺的青年，经过社员二人介绍，

就可入社。其他条文，现在记不起来了。

阳光社成立后，很多爱好文艺的青年纷纷要求加入。不久，社员即发展到三十多人，这些社员是：张德、归含、肖何（怀古）、季怀（漪斐）、钱学周、朱文元、归荷、程婉、胡水波、吴泽炎、郑孝培、凌如璋、孙佐晶、杨学诗、归亨豫、邹问渠、蒋育才、钱光烈、张耀勳、宗筱薇、归明、张幼华、杨燮堃、庞午、高奎章、杨剑门、杨小栋、屈根尧、朱兆林、周钟麟、吴迺、翁漪莲（张小文）、桑一冬、唐瘦青、陈海英、蒋经武等。召开社员大会时，济济一堂，很是热闹。社员大会后，即订出了一些活动计划。但由于社员的认识不同，因而爱好文艺也有所不同，有的社员喜读进步作家的作品，象鲁迅先生的《呐喊》、《彷徨》，蒋光赤的《鸭绿江上》、《短裤党》，以及屠格涅夫、妥思退益夫斯基、托尔斯泰、高尔基等的作品，也有部分社员爱看鸳鸯蝴蝶派的《人海潮》、《四杰传》之类的作品，甚至有人对《江湖奇侠传》之类着了迷。这种情况，不能不影响活动计划的实行，但大多数社员对新文艺的研究是感兴趣的，大家除阅读外，还写了不少习作，于是决定把原拟出版的《阳光》月刊付诸实现。因此社里成立了编辑委员会，实际工作从编辑、出版到发行全由归含与张德担任。我们召开编委会会议，有时在含晖阁本社，偶然也假座西仓前翁漪莲家中。

当时我们很想把刊物办得象样一点，即使够不上象上海出版的一些刊物那样，至少也不要貽笑大方。可是由于编委水平有限，来稿也较乏成熟的作品，所以在《阳光》第一期编成后，连编委自己也不很满意，感到这第一炮不会放得响了。但既已发排，也就硬硬头皮付印了，那是一本薄薄的三十二开本的刊物。

《阳光》的封面是张德和高奎章设计的，是一个初升的太阳，一半还在地平线下，其露出一半光芒四射，很是醒目。配上美术体的“阳光”两字，显得美观堂皇。

第一期《阳光》出版后，出于意外地很受青年们的欢迎，当时限于经济条件，只印了两百本，谁知发行后竟销售一空。对第二期，我们丰富了刊物的内容，改进了编排的形式，发个狠，多印了一百本，但仍是卖光了，甚至对太仓、苏州等地来索书的青年，弄得无法应付。这时社会舆论也给了我们较大的鼓舞，这样我们更是加强了信心。但由于发行工作做得不好，每期刊费总有不少收不回来，两期《阳光》的出版，社里赔累很多，所以勉强出到第三期后，只好暂时告一段落。这时大部分社员都到外埠继续读书去了，社务也就此停顿下来。

1929年一月，旅外求学的社员又陆续回到常熟度寒假。这时，常熟已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，言论、出版等自由已受到反动政府的限制，但青年们的心是热的，所以《阳光》虽在政治压迫和经济限制的情况下，仍然出版了两期。我们为了避免反动政府的注意，在第四期的社员录里，把凡是当时被认为“危险人物”的社员姓名，在征得本人同意后，一概没有登进去。同时我们在“编者的话”里还写上了这样一段：

“……本社完全是青年组织的，在沉闷的封建势力之下，我们也许要高喊起来革命，但是对于本刊的文字性质，却绝对没有限定（除却反革命的宣传）。我们相信政府是确定人们有出版、言论、集会……自由的，所以我们对社员的来稿，仍是应当尽量发表。”

所以要这样写，一方面为了缓和一下空气，一方面借此表示一下刊物的态度。至于“革命”和“反革命”的概念，只有我们自己心里明白。这时阳光社还未得到党的领导，对敌斗争

是不够坚强的。但这两期《阳光》的内容，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仍是鲜明的，所以有些作品尽管使用了比较晦涩的语句或是反语，但还是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极大注意。《阳光》在重重困难下勉强出到第五期，终于出不下去了。

二、在党的领导下成长

1929年春，中共常熟县委为了扩展宣传工作和扩大政治影响起见，决定在过去工作重点放在工农群众和店员方面的基础上，加强对知识分子的工作。党考虑到，当时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，对敌斗争十分尖锐复杂，但正因为如此，党必须告诉人民，我们的党还是存在的，并正在领导人民展开长期的艰苦的战斗。故党在当时，除开展经常的宣传活动如发传单、贴标语外，还策划建立一个党的外围组织，以便取得合法地位，开展公开活动，以利于开展宣传，打击敌人。这年夏季，旅外中共党员周文在返常。时沈雪侠担任县委的宣传，经过共同研究，认为如另建外围团体，易使敌人注意，不如利用现有的阳光社较为合适。因阳光社一贯宣称为研究文艺的团体，并出过几期刊物；成员虽然比较复杂，但除去少数资产阶级子弟外，有不少社员是大革命失败前的党团员，其余社员大部分是在外埠求学的大中学生，接触进步思想较易。最后经县委研究决定，由周文在（化名周秦）和沈雪侠参加阳光社，以便帮助阳光社进一步开展活动。周文在、沈雪侠入社后，社务有了新的发展，活动也加多了。

这年暑假，阳光社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改组，先由内部同志开会商讨，参加者有沈雪侠、周文在、张德、萧怀古和归含等，记录是沈雪侠担任的。会上先把章程中的宗旨部分作了修改，再讨论了活动计划，最后决定内部分工：仍由归含担任社

的负责人；周文在和张德担任上海的联络与发展工作；沈雪侠主要执行党的任务，社内不拘名义。

这年秋天，召开社员大会，我们把修改后的章程提交大会讨论，到会的大多数社员是赞成的，但有小部分资产阶级出身的社员如杨剑门、桑一冬等，却有的要求退社，有的拒交社费。这不仅使我社在经济来源方面受到一定的影响，而且在政治上也受到一些阻力。对这些社员，经执行社务的同志决定，予以除名，虽未公开宣布，实际已无权过问事务。从此，外界对我们不利的传说也多起来了。

1930年一月，阳光社被党正式认为党的外围团体，但这事除部分社员外，绝对保密，当我们把社内情况向县委作汇报后，经过县委分析研究，认为：（一）社内出现分化现象是必然的，一般公子哥儿看到进步力量是会吓倒的。要求我们除纯洁组织外，更好地团结进步社员，巩固社的组织。（二）至于外界传说，正是文化“围剿”的先声，应予密切注意，提高警惕。（三）《阳光》虽因经济困难无法继续出版，然而这一方面的宣传活动总不能就此偃旗息鼓。县委的指示，经过社内有关同志的讨论，决定暂借本县日报副刊地位出版一个周刊。当时县委组织汪新民正在邑人俞鸥侣创办的《大报》担任主编，沈雪侠也是该报编辑，有了这项便利，社里拟出的一个周刊《一周文艺》就在当年三月假《大报》创刊了。

《一周文艺》的编辑工作是由周文在、沈雪侠负责的，版面上刊明“阳光社编”。稿件大部分由在上海的社员供给。记得第一期的发刊词是沈雪侠写的，周文在因已引起敌人注意，故在该刊上概不露面。当时上海正掀起普罗文学（无产阶级文学）的热潮，左翼作家在党的领导下，正在进行声势浩大的反文化“围剿”斗争。《一周文艺》上也刊出了周文在（化名浅

岛文子)写的《论普罗文学》和《普罗文学论》等稿子。出到第四期,外界不利于我们的空气不断袭来,甚至那时在国民党县党部工作的石栩澂曾对归含说过:“你们太露骨了!”我们对这些情况进行了研究,最后决定不为反革命势力所吓倒,坚持《一周文艺》的编辑、出版。

就在这时,阳光社参加了成立不久的“左联”,旅沪的周文在和张德都曾代表阳光社参加过“左联”的会议。所以后来阳光社被敌人查封后,“左联”的机关刊物《拓荒者》还在“文坛通讯”栏里登过一段消息。

《一周文艺》的出现,虽然时间不长,并已处于白色恐怖笼罩的时期,但是由于有了党的正确领导,该刊的战斗力始终是旺盛的。其中周文在的几篇战斗性的宣传无产阶级文学的文章,更是受到青年的欢迎。记得凡有《一周文艺》出刊的那天《大报》,总要多印一些供青年学生,这不但反映出当时常熟青年的要求进步,而且也说明了这小小周刊在反文化“围剿”中也起过一定的作用。

三、一场尖锐的斗争

由于《一周文艺》宣传无产阶级革命文学,明显地表明了阳光社的立场,使国民党常熟县党部的几个反革命头子石民佣、吴中英、安蔚南等大为震惊。据说他们先后开了几次会,向省方密报了阳光社的活动情况,并在接到省方指示后,处心积虑待机而动,妄图把阳光社(当时他们认为是党组织)社员一网打尽。

1930年三月里,归含因婚辍学在家,时与沈雪侠联系,研究发展社务。五月一日国际劳动节,在常熟的社员举行了一次小型纪念会,并决定在五月五日纪念马克思诞辰,拟请人做个

有关马列主义的报告。谁知就在这天，一场尖锐的敌我斗争展开了。

五月五日这天是星期一，天气晴朗，上午八点钟左右，当时伪公安局的督察长程崇礼（景川），国民党县党部委员李浚源带着十来个便衣警探，腰佩短枪，悄悄地来到含晖阁十四号阳光社的所在地，包围了归含的家。这时归含因事外出，程崇礼进屋后，找到了归含的妹妹归明，诓她说。“我们是上海来的，有要事找归含同志面谈。”归明以为确是自己人来了，就连忙到隔壁淑琴女中去借电话找归含回来。等到九点钟左右，程崇礼、李浚源等得有点不耐烦时，归含回来了，刚进门就被逮捕了。这时归含的堂弟归象随看见这情况，趁人不注意时，一溜烟跑到外面，去找沈雪侠。走到虞山言子墓附近，刚好碰到沈雪侠，时沈已得王耕英走告邹逸中被扣等消息，当听到归象随所告情况，心想阳光社果被敌人袭击了，但如果就此跑掉，不仅对归含和广大社员产生不良影响，而且对今后执行党的任务，更会受到无法估计的损失；另一方面，认为自己在阳光社反正是一个普通社员，《一周文艺》的编辑工作是内部分工，外人不知道，至于党员身份更是从未暴露过。为着党的长远事业，为着道义上的驱使，于是就大胆前往。谁知刚到含晖阁归含家，程崇礼和沈是素识，一见就说：“你来得正好，请等一下！”这样也被捕了。至此，敌人的狰狞面目毕露无遗，程公开指挥警探肆意搜查。幸得归明人小机警，她趁我们被捕的刹那间，偷往阳光社办公的地方把许多文件书籍迅速藏了起来。敌人虽翻箱到篋，只拿到了归明收藏时失落下来的几份会议记录，一两篇尚未发表的文稿，以及几本《列宁青年》和《中国青年》，这些东西后来都做了伪高等法院起诉的“罪证”。

与查封阳光社的同时，伪公安局还查封了《大报》馆，并拘捕了该报发行人俞鸥侣。但俞确是一个商人，对阳光社的一切活动全未知情，所以只花了一笔钱就获得交保释放。

我们被捕后，押在章家角伪公安总局里，直到下午，由伪公安局派了大批伪警押送至翁府前伪县政府。到达后，敌人却装出一付假仁假义的“文明”来，不但替我们除去了手铐，而且还“招待”在会客室里。这时会客室里有一人闷声不响地坐着，这人就是当时县立农场主任邹逸中。原来石民佣等一面妄想消灭革命力量，要把阳光社社员一网打尽；另一方面还阴谋把与他们有私怨的人也诬陷入狱，所以石民佣硬说阳光社社员录中的邹问渠就是邹逸中的化名，因之在那天当邹逸中参加纪念周（这是反动政府每周一次的例会）时，就把他扣留了。邹逸中与我们见面后，就告诉我们说，他上午被扣后已托人告诉过王耕英（王虽不是阳光社社员，但在社员中有半数相识），要王转告大家。邹逸中并要求我们给他证明不是邹问渠，以免被阳光社的案子牵连。我们因邹问渠的确不是邹逸中（邹问渠是邹莲珍的化名，她是一位小学教师。）当时就一笑答应了，并安慰了他几句。其时会客室外便衣警时隐时现，那种戒备森严的情况，使人感到事态非常严重。

那天常熟的伪县长谭翼珪，刚巧到南乡练塘去公干，国民党县党部石民佣等派人通知他连夜返城，秘密审讯我们。那夜我们在会客室一直等到深夜十二点钟左右，才被提审。

伪县政府在最后一进屋里建立了一个临时会审庭，参加会审的有伪县长谭翼珪，国民党县党部代表张禹声，法官顾裕尚，还有一个不知名的军官和一个书记员，庭内外军警林立，俨然大狱。审讯时谭翼珪用尽哄骗、恐吓手段，但我们只承认阳光社是反帝反封建的文艺团体，根本不承认与共产党有什么

关系，更不知共产党的活动。谭翼珪甚至拍桌击案，张禹声从旁加油，都无法问出什么“口供”来。对于邹逸中，因无法证实他是邹问渠，庭上只好同意他交保候讯。经过两小时的庭讯，已是深夜二时了。我们当夜即被押送到方桥头的看守所里拘留起来。

那天，党组织的活动也是频繁的。当党知道阳光社被查封的消息后，就通知有关党员走避。如汪新民刚陪着他儿子从苏州医眼睛返常，到达汽车站时，就有人知照他《大报》被封等消息，他就离开了常熟。所以那天除阳光社遭到了较大的损失，县委宣传沈雪侠被捕外，党组织未受损害。

我们被押在看守所里，一连几个星期未被提审。原来石民佣等一面还在千方百计地想找寻线索妄图扑灭革命的火焰，一面四出追捕阳光社社员。据说当时常熟《琴报》在阳光社被查封的第二天因登载了一则有关的新闻，竟也受到国民党县党部的警告哩。

案发后的一个多月过去了，敌人的阴谋无法得逞。于是石民佣等恼火了，坚持要求反动政府把我们的案子送镇江军法会审处审理，这个机关是当时人所共知的专为迫害共产党人设立的，石民佣等实际上是要想置我们于死地。可见敌我斗争是尖锐的，敌人的手段是阴险毒辣的。这个消息传出后，我们的家属四出求援，地方人士俞九思、俞承修等也仗义力争，反动政府才不得不把我们移解苏州伪高等法院审理。经过伪高等法院三番五次的审理，案情根本没有什么发展，最后伪高等法院只好按照反动政府颁布的所谓“反革命紧急治罪条例”的条文，并引述《一周文艺》中涉及阶级斗争的语句，把我们各判了一年六个月的徒刑，关在第三监狱。1931年秋天，江苏省成立“反省院”，反动政府又把我们移送该院“反省”。直到1932

年夏天，归含获释。又隔了三个月，沈雪侠也获释放。

当阳光社被查封时，上海的部分社员如周文在、张德、吴泽炎、萧怀古、归亨豫等，由于王耕英赴沪报警，他们就立即避居静安寺泰安坊的一个小楼上，因而未遭意外。他们离开了自己的学校，虽然仍随时有被捕的危险，但仍坚持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文学的学习，并提出了“阳光不灭”的口号，坚持着反文化“围剿”的战斗。其间反动政府曾屡次派人和上海租界的帝国主义的巡捕房联系协缉，但周文在等早已离开了自己所在的几个大学，所以敌人只落得个徒劳往返。

一场尖锐的敌我斗争告一段落，敌人虽然用尽心机，但结果还是以我们的反文化“围剿”斗争胜利而告终。

四、尾 声

1932年，正处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。敌人的第三次军事“围剿”失败后，刚刚出卖了上海抗日战争的蒋匪帮，正在作第四次的猖狂进攻。同时，在所谓文化“围剿”彻底失败后，就使用更加毒辣凶残的手段来对付左翼作家们。这时阳光社的主要成员有一部分人坚持战斗；一部分人表现消极，甚至也有投入敌人怀抱中去的。我们出狱时，周文在由于工作关系，暂处家乡，张德未几亦远走河南；钱学周、朱文元、凌如璋、吴泽炎等或去京沪，或隐家乡；萧怀古则已投向蒋匪南京励志社干部训练班受训后，供任伪职了。

归含出狱回常，即遭到国民党县党部的所谓特派员的监视，行动很不自由。九月里沈雪侠获释后，因不愿执行反省院向当地国民党报到的规定，径去上海养病。敌人知道后很是震怒，然已鸿飞冥冥，亦无如之何。时沈雪侠与组织已失去了联系，未能再度参加。同时，在社员星散的情况下，我们原拟重

振旗鼓恢复阳光社的想法，一时也无法实现。

到1933年，归含得程飞白同志的帮助，摆脱了敌人的监视，偷偷地溜到上海正风文学院继续求学。在校又碰到凌如璋，与沈雪侠也见面了。归含在凌如璋的怂恿下，把过去在狱写成的一部分诗稿编成了一本《苦囚集》，决定仍用阳光社名义出版，以示“阳光不灭”之意；一方面我们商量再拟恢复阳光社组织，继续进行活动。谁知诗稿送印时，印刷所见到“阳光社出版”的字样后，慑于反动派的淫威，竟不敢承印。最后归含只好改用笔名，出版社改成“银夜社”后，才由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印行。

这一年里，归含、沈雪侠、凌如璋、吴泽炎等还是经常保持联系，但目睹国民党反动派日益勾结帝国主义，感到未来的敌我斗争更加尖锐复杂，自己也决不能满足于文化方面的斗争了。因此，在抗日战争开始后，归含、沈雪侠均随同周文在同志参加常熟东乡游击队，后改编为“江抗”。归含在西进途中因体力不支患病，经组织批准返家休养。沈雪侠曾随军辗转于苏南北、皖北间，因受伤后病重。在进军盐城途中，过姜堰时，经新四军挺纵江南政治部首长批准，返江南休养。

总的说来，阳光社虽然存在不久，且被敌人扼杀了，但它的影响是深远的，其中有些社员和爱好阳光社的青年，后来参加了革命工作。由此，对敌人的震动也很大的；甚至外来的日寇，于1944年在常熟进行大逮捕时，对有的被捕者，竟以“参加阳光社”为“理由”，借以扩大“罪行”呢。

小 小 的 声 明

本文所记，大都是三十年前旧事，虽经我们认真的核实和屡次的修改，并承有关同志和朋友们在百忙中抽暇证实及提供

意见，使本文在主要事实方面得臻完善，但仍难免有遗漏的地方或枝节上的差异，尚祈读者不吝指正是幸。